

对夏商分界的一点看法^{*}

谢 肃

(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 广东 广州市 510275)

关键词: 夏商分界 二里头文化 早商文化

摘要: 从夏商文化在夏商之际地域分布的变化看, 夏商分界当在南关外型商文化第一、二组之间。二里头四期晚段文化是最晚阶段的夏文化, 其绝对年代没有进入早商。

KEY WORDS: Transition of the Xia and Shang Dynasties Erlitou Culture Early Shang Culture

ABSTRACT: According to a stud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Erlitou culture and the Shang culture and its spatial change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late Xia to the early Shang Dynast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rchaeologically the transition should occur between the first phase and second phase of the Nanguanwai subtype of the Shang Culture. The second half of Erlitou Phase IV should be viewed as the latest period of the Xia culture and earlier than the Early Shang Dynasty in terms of its chronological position.

夏商分界和早期夏文化问题是探索夏文化的两个最基本的课题, 学者们为此倾注了相当多的心血, 提出了多种学说^[1]。本文欲在前贤的研究基础上谈谈对夏商分界的一点看法。

以往关于夏商文化分界的讨论中, 都城分析法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目前大部分学者所达成的共识——二里头文化主体是夏文化, 二里岗期文化是早商文化^[2], 也与都城分析法密不可分。但自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 学者们开始试图摆脱毫都的争议, 从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期商文化的空间分布变化来探讨夏商文化的更替。

如邹衡在谈及夏商分界时就列举了三条证据: “其一, 在文化特征上, 南关外期(即二里岗下层偏早阶段)与豫北和冀西南更早的商文化比较接近。其二, 南关外期在黄河以南的分布点极少, 在郑州也不多, 未达到商文化的最繁荣阶段。这应该反映商人南渡不久, 尚未灭夏的情况。其三, 郑州商文化从二里岗下层偏晚开始, 分布范围扩大, 并大量吸收二里头文化因素而进入最繁盛期。这应该反映灭夏以后已建立商王朝的情况。”^[3]

刘绪也在多篇文章中强调, 二里岗下层时

期, 商文化向南、向西扩张, 完成了对二里头文化的全面替代。此现象“无论从时间, 还是地域上看, 都与夏商更替相符”^[4]。

笔者在此遵循先生们的方法对夏商之际夏商文化地域上的变化作一考察。考察前先介绍一下所依据的时间标尺。

偃师商城发掘者把偃师商城商文化分为三期六段或三期七段。笔者也曾把郑州商城的早于二里岗下层晚段的商文化遗存(即邹衡所说的南关外型)分为三组^[5], 分别以南关外遗址的南关外下层、南关外中层和二里岗 C1H9 为代表。其中第二、第三组分别相当于偃师商城的第一期第一段和第二期。第二组单位由电力学校 H6、商城东城墙 CET7 四下层等单位的存在看, 在郑州地区, 此阶段是普遍存在的。第三组中南关外 H62 出土陶鬲(H62:16)口沿有一周凹槽, 从类型学上分析, 此类陶鬲要晚于以 C1H9:36 为代表的陶鬲。在偃师商城的分期中, 这两类鬲被视为不同组的典型器。但在郑州商代遗址, 这两类鬲多共存于同一单位(如 C1H9), 不见层位上的早晚关系。故偃师商城的分期不具有普遍性, 至少不适用于郑州商代遗址。

^{*} 该文受到 2011 年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山大学青年教师培育项目资助, 项目编号为: 1109040-24000-1137101

郑州地区,“南关外型”第一组遗存见于南关外^[6]、化工三厂^[7]等地点。第二组遗存不仅见于郑州商城,还见于大师姑遗址^[8]。第三组遗存的分布更广泛。

洛阳地区,“南关外型”第二组遗存只见于偃师商城遗址^[9]。

晋南地区,“南关外型”第二组遗存见于东下冯遗址^[10]。“南关外型”第三组遗存主要见于垣曲商城(垣曲商城 H158、H6)^[11]和东下冯遗址。侯马上北平望遗址采集到过此阶段的陶鬲^[12]。

关中东部地区,“南关外型”第三组时商文化可能已经到达此地^[13]。

丹江上游的商洛地区,在稍晚于“南关外型”第三组但早于二里岗下层晚段时期,商文化已经到达东龙山遗址^[14]。

在夏商之际商文化中最具时代意义的是灰陶薄胎鬲,我们把典型商文化遗址出土的此类陶鬲排列成图一。从商文化空间扩张来看,笔者倾向于把夏商文化分界定在“南关外型”第一组与第二组之间。

那么“南关外型”第一、二组与二里头文化

的关系是什么样呢?是不是“南关外型”第二组和二里头文化四期或四期晚段同时,二里头四期或四期晚段文化是夏遗民的遗存呢?笔者认为“南关外型”第二组晚于二里头四期晚段,二里头四期晚段没有进入早商。理由如下:

第一,郑州大师姑遗址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单位被南关外型二组单位打破或叠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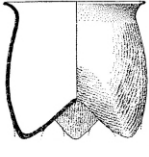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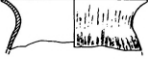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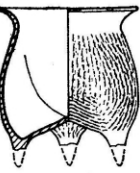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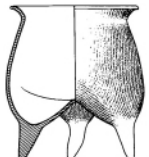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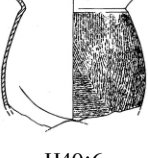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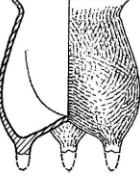
大师姑遗址的二里头文化遗存被分为五段,其第五段相当于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属于此段的灰坑 H16 被相当于“南关外型”第二组的灰坑 H9 打破,H16 又打破与其同时段的 H23。H16 出土深腹罐、圆腹罐、折沿盆、捏口罐等陶器(图二)。H9 出土灰色薄胎鬲(H9:1)和褐色厚胎鬲(H9:5)各一件及其他陶器(图三)。

此外,大师姑遗址相当于二里头四期晚段的灰坑 H34 被相当于“南关外型”第三组的早商灰坑 H40(图一)叠压打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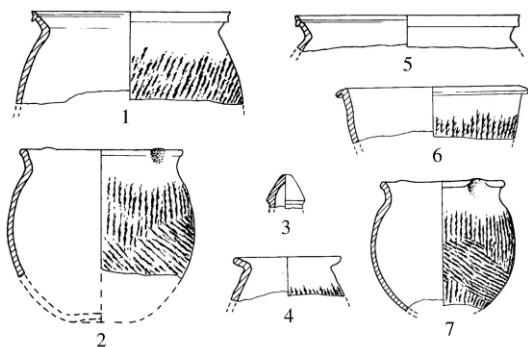
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的遗迹间常见相互打破关系,如大师姑 H16 打破 H23,H18 打破 H19,H17 打破 H27,但不见四期晚段单位叠压或打破早商单位的现象。所以以上单位的层位关系表明“南关外型”第二组晚于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

第二,郑州商城范围内普遍发现商文化遗迹叠压或打破洛达庙期遗存。

如在黄委会青年公寓就有洛达庙早、中、晚期的文化堆积。其中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洛达庙晚期文化层厚 0.2~0.8 米,遗迹也丰富,有陶窑、灰坑等^[15]。而黄委会青年公寓西距年代不晚于“南关外型”第二组的宫室建筑 C8G15 仅 405 米,距宫室建筑 C8G10 只有 165 米。郑州商城墓葬 C8M28 位于商代宫殿遗址区内,此墓被二里岗下层二期文化层叠压,随葬陶爵和陶盃。《郑州商城》将其归入二里岗下层一期,李志鹏先生认为其属于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16]。宫殿区是商王室重地,怎么会允许夏人在此烧窑、挖坑,生息繁衍呢?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只能解释为这里的洛达庙期遗存是夏人在商人

	郑州商城	偃师商城	大师姑	东下冯
南关村型第二组	 南关外 T87:47	 T32⑨B:1	 大师姑 H9:1	 T1082:4:65
南关外型第三组	 二里岗 H9:36  南关外 H62:16	 G2:8  H8:1	 H40:6	 T1088:3:1

图一 相关早商遗址出土陶鬲



图二 大师姑 H16 出土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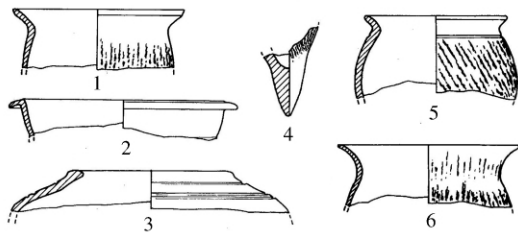
- 1、5. 深腹罐(7、6) 2、7. 捏口罐(4、11)
3. 盖钮(9) 4. 圆腹罐(8) 6. 盆(10)

到来前创造的。

第三,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四期时仍然是伊洛地区的中心聚落。

二里头遗址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时,“遗址规模并未缩小”,“宫殿区仍延续使用,范围甚至有所扩大”。墓葬出土“青铜容器和玉器等礼器的数量和质量均超过三期”^[17],铸铜和绿松石制造作坊仍在使用的^[18]。凡此表明二里头文化四期时,二里头遗址“仍聚集着大量的人口,存在着贵族群体和服务于贵族的手工业”^[19],二里头遗址仍然具备中心聚落的地位。

当然政权的更迭与都邑的兴废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如《史记·周本纪》记载,牧野之战后,战胜的周人曾在殷都“除道,修社及商纣宫”。纣都的荒废当在周公东征以后。但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同处洛阳盆地内,相距约6公里。大家知道中心聚落的形成是一定区域内诸资源集中的结果,在中心聚落所服务的聚落群中,其具有独一性或排他性。所以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遗址在作为同一区域(它们所服务的聚落群规模当有差异,但都服务于伊洛地区)的中心聚落的时间上只能是先后,而不会是同时。



图三 大师姑 H9 出土陶器

- 1、6. 高(5、1) 2. 盆(4) 3. 敛口尊(2)
4. 高足(7) 5. 圆腹罐(3)

第四,南关外期文化(指南关外遗址下层一类遗存)、二里头四期文化和偃师商城一期文化中岳石文化因素数量上的差异是其时代早晚的反映。

南关外期文化遗存包含了大量岳石文化因素,此后商文化中的岳石文化因素逐步减弱,至白家庄期再达到高峰。二里头遗址二里头四期晚段也包含有大量岳石文化因素。如属于四期晚段的ⅢH23发表9件陶器,其中褐陶2件、灰褐陶1件^[20],其褐陶所占比重近1/3。“器类方面。二里头四期遗存中新出现了有细道划纹(‘篦纹’)的夹砂中口罐(VH53:12)和陶甗(西北T1③:1)、卷领细绳纹鬲(VH53:10)、卷领鼓腹深腹盆(ⅢH235:1)、浅盘细柄豆(VIM1:2)等新器形,这些陶器不见于二里头一至三期,却是‘南关外期’或岳石文化的常见器物”^[21]。但偃师商城遗址却罕见岳石文化因素^[22]。也有学者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因为地域的不同,即郑州更接近岳石文化分布区^[23]。但同处伊洛地区的二里头遗址却有比偃师商城遗址更多的岳石文化因素,故用地域的不同来解释是行不通的。反而可能是时间原因所致。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相当于“南关外期”),绝对年代相当于夏朝末年,文献记载此时的夏、商、夷关系密切,交往频繁,此背景造成了南关外期文化和二里头四期晚段文化中岳石文化因素所占比重较大。而商夷联合伐夏战争结束后,夷人退去,商文化中岳石文化因素锐减,属于早商的偃师商城自然就罕见岳石文化因素了。南关外期以后郑州地区岳石文化因素逐步减少的现象可能也是此背景的反映^[24]。

“二里头文化四期已经进入早商,二里头四期文化是夏遗民的文化”这一观点最早是由孙华提出的^[25]。目前坚持二里头四期或四期晚段文化为夏遗民文化的学者在论据上大体沿用孙先生的证据,或略作增补^[26]。这些证据主要是:一、偃师商城商文化第一期第一段单位陶器群一方面具有浓厚的二里头四期或四期晚段文化因素,另一方面又具有典型商文化因素^[27]。二、二里头四期或四期晚段文化中涌现大量商文化因素^[28]。三、二里头四期或四期晚段文化的碳十四测年表明其已经进入早商。

关于第一条证据,笔者以为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二里头四期晚段和“南关外型”第二组之间虽有早晚关系,但这两个时间段是相衔接的,偃师商城第一期第一段遗存发现极少,恰说明此遗存所代表时期是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与“南关外型”第二组的衔接时期。第二种解释是:偃师商城第一期第一段遗存位于祭祀区(曾称为“大灰沟”)的最底层,即此堆积的土原是用以覆盖祭祀遗存的。偃师商城范围内虽没有发现二里头文化遗迹,但屡有二里头文化陶片发现,有学者推测偃师商城范围内当有二里头文化遗址^[29],那么祭祀区最底层的用土可能就是取自二里头文化遗址,那么这些单位中的具有二里头文化风格陶器就不能代表这些单位的年代^[30]。

关于第二条证据,笔者认为也是不能成立的。笔者在读《偃师二里头》^[31]时也为二里头四期文化中大量的商文化因素所困惑。但2006年冬,笔者两次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标本室观摩二里头文化陶器,看到了二里头文化四期单位修复的大部分陶器,至此笔者才意识到目前所发表的二里头遗址的二里头四期文化陶器并不能反映该时期陶器群的全貌。若盲目取信于已发表陶器所展示的陶器群,则必定对其文化性质产生惑疑。

在发掘、室内整理、挑选用于发表的标本的过程中,我们对特殊器物的关注往往比较多。而特殊器物的碎片在拼对时也容易集中。从此角度出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发表那么多属于二里头四期文化的商文化因素陶器了。

还有学者举出郑州洛达庙晚期单位中的商文化因素来说明其已进入早商。据对郑州商城宫殿区夯土墙区域发掘的洛达庙晚期单位陶器群的统计,其中二里头四期晚段文化因素约占85%,商文化因素约占10%,岳石文化因素约占5%^[32]。黄委会青年公寓的洛达庙期陶器群的器类没有统计数据,但据发表的器物标本看,其中的诸文化因素所占比重大体与宫殿区夯土墙区域的统计相同^[33]。但这是与商文化存在巨大差异的,譬如前文提到的大体相当于二里头四期晚段的南关外型遗存。这里以大师姑遗址的二里头四期晚段灰坑H38和大师姑略晚于“南关外型”第三组的灰坑H55的器类组合做一说明。

H38出土深腹罐5件(占陶器群比例41.67%,下文括号中数字含义同此)、圆腹罐2(16.67%)、甗1(8.33%)、鬲1(8.33%)、盆1(8.33%)、大口尊1(8.33%)、器盖1(8.33%)。H55出土鬲9件(18.37%)、甗2(4.08%)、鼎2(4.08%)、大口罐1(2.04%)、中口罐7(14.29%)、篦纹罐4(8.16%)、小罐1(2.04%)、大口尊1(2.04%)、深腹盆6(12.24%)、中腹盆4(8.16%)、浅腹盆2(4.08%)、捏口罐3(6.12%)、大口瓮2(4.08%)、小口瓮3(6.12%)、敛口瓮2(4.08%)^[34]。由此看来,二里头四期晚段文化的陶器群不仅与其同时期的商文化陶器群而且与晚于其的商文化陶器群的差异是相当巨大的,一个是罐(深腹罐、圆腹罐)文化,另一个则是鬲、盆(先商时期平底罐数量也较多)文化。

其实,商文化因素在二里头文化中的出现并不是二里头文化四期才发生的事情,最迟发生在二里头文化三期^[35]。而且在个别遗址,此时期商文化因素所占比例不小于二里头四期晚段时期。如郑州黄委会青年公寓的洛达庙中期文化就出土陶鬲6件、橄榄形罐1件(T45⑥:18),它们占所发表陶器的10.5%左右(按口沿统计,器足不计)。

坚持二里头四期或四期晚段文化为夏遗民文化的学者所信从的是,夏商王朝的更替过程中物质文化的发展滞后于政治事件的发展,即物质文化是渐变的。倘若果真是渐变的,那么在考古上也应该有文化因素呈现渐变的一系列单位。即不单有象洛达庙晚期那样商文化因素占10%,二里头文化因素占85%的单位,还应该发现商文化因素占20%,二里头文化因素占75%的单位等等一系列单位。但至今没有发现(偃师商城一期一段遗存是孤证,其中的夏商文化因素的兴衰变化也不成系列)。

所以不能过分强调二里头四期或四期晚段文化中的商文化因素,它们仅仅是文化交流的结果,不能看作是夏商更替的证据。

关于第三条证据,笔者以为需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1. 关于商之始年

关于商的始年,向无上古史籍可凭。学界一般根据估定的西周始年加以文献记载的商代积

年来推算商始年。且不说西周始年估定的诸多差异,单就商之积年,后世有多种说法。陈梦家归结为两类,即 500 年和 550~600 年。陈先生以后者为可信,遂参照《竹书纪年》对西周积年的记载,“姑定纪元前 1600 年为商代的开始”^[36](下划线为笔者所加)。此说影响极大,为很多研究夏商文化的学者所征引。《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 年阶段性成果》(简本)^[37]也对夏商周年代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其中估定公元前 1600 年为商始年。刘绪曾指出过此说对文献取舍上存在的问题^[38]。

相对于以公元前 1600 年为商始年的观点,赵光贤则以公元前 1045 年为周武王伐纣年,公元前 1055 年为武王即位为君年,又根据《竹书纪年》关于商积年的记载,把公元前 1551 年作为商始年^[39]。此说在考古界的信从者相对第一种说法较少。近年王巍在其大作《中国古代国家形成论纲》中把商王朝代估定在公元前 1550 年~公元前 1046 年^[40],此说与赵光贤观点相近。

以上列举的商始年研究成果,相差 50 年左右,相当于考古学文化的一个期段。

2. 系列样品碳十四测年

碳十四测年技术是自然科学方法在考古学研究中应用的典范,对考古遗存绝对年代的判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其所测定的年代数据为一个时间段,也即该时间段内的任何一个时间点均有可能是该碳十四标本的形成年代。由于三代及三代以降的考古学研究对年代要求较为精确,而碳十四测年所得的时间段往往相当于考古学分期中的一个期段,这样一来碳十四测年数据只能被研究者作为参考。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过程中,碳十四测年研究者尝试采用把有年代早晚关系的碳十四进行系列采样,分别测出其年代,再根据其早晚关系,来校正其年代,以此来缩短测年所得的时间段。然而此方法在实际操作中是存在问题的。

第一,考古遗迹单位出土遗物的时代往往并不单纯,我们一般以所出最晚器物(一般是最晚的陶器)的年代来作为该单位的年代。而该单位所出碳十四标本可能会早于、也可能晚于该单位陶器编年的年代。即碳十四标本的年代不一定

能代表该单位年代。所以有层位关系的进行了系列采样的碳十四标本之间(甚至这些标本所出单位在陶器编年上具有早晚意义)的早晚不一定与层位关系所揭示的早晚关系一致。

第二,考古学分期好像是锁链,每一期就象一环锁链嵌入相邻的锁链中。也就是说考古分期所标示的早晚是相对的,第一期的晚段未必就早于第二期的早段。那么,那些没有直接层位关系,而由陶器编年系联起来的“系列碳十四”标本之间的早晚关系也就更不易确定了。碳十四系列样品所依赖的考古学分期越细,校正后的测年数据出错的风险越大。

基于上述两点,一旦系列样品中的一个样品不能代表其所出单位的年代,那么用系列样品测年数据校正后得出的系列测年数据就未必是可靠的。所以试图通过碳十四系列样品来缩小碳十四测年的误差,其风险是极大的。

此外,碳十四测年数据还有一个年代范围的概率问题。此处且不论。

总之,商的始年我们并不知晓,而碳十四系列样品测年很难准确。试图通过比较这两个不确定的年代来解决夏商分界,只能是看上去很玄的东西。

还有学者认为大师姑遗址 T1 内自西向东依次排列着的墓葬 M1、M3、M4 和 M2 构成了一处商文化墓地。郑州地区商文化的出现意味着商王朝的建立(此逻辑为笔者揣摩原文得出)。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灰坑打破 M1,那么二里头四期文化晚段已经进入早商,其文化性质应属商文化或夏遗民文化^[41]。

查发掘报告,这 4 座墓葬中时代最早的 M1 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李志鹏认为属于二里头文化三期晚段^[42]),最晚的为早商三期(相当于二里头上层一期)。如果这是一个墓地的话,在其使用期间墓葬不应该被破坏。但 M1 却被二里头四期晚段灰坑 H18 打破, M2 也被与同时期的 H21 打破。由此看来,此处不是商人的一个墓地。至于随葬陶鬲和带鸡冠耳陶盆的 M1,只宜视作商文化因素,不能作为郑州地区已为商人控制的证据。

总之,笔者认为南关外型第一组是最晚的先商文化,第二组是最早的早商文化,二里头四期

晚段文化是最晚阶段的夏文化,其绝对年代没有进入早商。

- [1] 关于夏商分界的诸多学说已为学界熟知,笔者不再赘述;关于夏文化探索中学者们所采用的方法参见杜金鹏.试论夏文化探索[C]//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
- [2] 笔者下文的讨论也是以此共识为基础的。
- [3] 邹衡.综述夏商四都之年代和性质[J].殷都学刊,1988(1).收入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 [4] a.刘绪.商文化在西方的兴衰[C]//纪念殷墟发掘8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刊).b.刘绪.早商文化的考古学横向观察[C]//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 [5] 谢肃,张翔宇.试论南关外型商文化的年代分组[J].中原文物,2003(2).尽管笔者认为邹衡先生所说的南关外型跨先商和早商两个时期,但为称呼方便,笔者仍用南关外型第一组等命名分组。
- [6] a.河南省文物工作队.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址的发掘[J].考古学报,1973(1).b.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一九五三年——一九八五年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本文图一所用南关外遗址和二里岗C1H9陶器线图采自这两个报告。
- [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工作站.郑州化工三厂考古发掘报告[J].中原文物,1994(4).
- [8]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师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本文所用大师姑资料均出自该书。
- [9] 本文图一所用偃师商城陶器线图采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商城北部“大灰沟”发掘简报》、《河南偃师商城小城发掘简报》、《河南偃师商城东北隅发掘简报》,均收入杜金鹏、王学荣主编:《偃师商城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分别原刊于《考古》2000(7)、1999(2)、1998(6)。
-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夏县东下冯[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本文所用东下冯陶器线图均采自本书.东下冯遗址T1082:4层,报告误归入二里头四期文化,刘绪先生已经指出,见刘绪.东下冯类型及相关问题[J].中原文物,1992(2).
- [11]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垣曲商城[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
- [12] 侯马市博物馆.山西省侯马市上北平望遗址调查简报[J].华夏考古,1991(3).
- [13] 或认为老牛坡商文化第一期可以早到二里岗下层偏早阶段,但此期典型器陶鬲ⅡH5:7、H7:8当属于二里岗下层晚段.据张天恩先生批露,在赵庄、白村遗址发掘到“南关外型”第三组时期遗存,见张天恩.关中商代文化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123.
- [14] 王力之.试论商洛地区的夏商文化[D].北京: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1999.
- [15]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黄委会青年公寓考古发掘报告[G]//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 [16] 李志鹏.二里头文化墓葬研究[C]//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 [17] 许宏,陈国梁,赵海涛.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J].考古,2004(11).
- [18] a.郑光.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中国考古学上的一个里程碑[C]//夏文化研究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6.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城及宫城区外围道路的勘察与发掘[J].考古,2004(11).
-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考古新发现[J].考古,2005(7).
-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1980—1981年Ⅲ区发掘简报[J].考古,1984(7).
- [21] 裴明相.论豫东岳石文化[C]//河南文物考古论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 [22] 王学荣.偃师商城第一期文化研究[C]//三代考古(二).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 [23] 高伟,杨锡璋,王巍,杜金鹏.偃师商城与先商文化分界[J].考古,1998(10).
- [24] 都邑往往是诸文化因素积聚之地,二里头遗址和郑州商城遗址的岳石文化因素或可以此解释,照此解释必须假设偃师商城在早商初期不是整个商文化范围意义上的中心聚落.此处笔者且把此现象作为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早于早商的旁证。
- [25] 孙华.关于二里头文化[J].考古,1980(6).
- [26] 孙华先生论据有三,其中第一条是二里头遗址是夏都阳城,二里头一号宫殿建筑基址在四期废弃与商灭夏有关.除了这一条外,其余两条为现在坚持夏商分界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间或四期早晚段之间的学者所反复征引。
- [27] 同[23].
- [28] 有不少先生曾对二里头四期或四期晚段文化的文化因素做过分析.笔者不一一具引,可参阅王立新.也谈文化形成的滞后性——以早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形成为例[J].考古,2009(12).
- [29] 杜金鹏.偃师商城初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45.
- [30] 雷兴山先生主张此种解释。
- [3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该报告是二里头遗址数十年发掘的第一本报告,是老一辈考古学家汗水和心血的结晶,笔者以目前考古报告的标准来要求该报告,确实是吹毛求疵了.而此瑕疵也不会动摇该报告在夏文化探索上的地位。
- [3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郑州商城宫城区夯土墙1998年的发掘[J].考古,2000(2).

(下转100页)

- [31] 蒋福泉. 仙游寺、法王塔及地宫秘密[J]. 西安教育学院学报, 1999(1): 37.
- [32] 道世. 法苑珠林(第38卷)[C]//大正新脩大藏经. 第53册: 2122.
- [33] 同[11].
- [34] 同[30].
- [35]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 甘肃省泾川县出土的唐代舍利石函[J]. 文物, 1966(3): 12.
- [36] 临潼县博物馆. 临潼唐庆山寺舍利塔基精舍清理记[J]. 文博, 1985(5): 14.
- [37] 宋敏求. 唐大诏令集[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2: 538.
- [38] 会宁(诃陵国)若那跋陀罗译. 大般涅槃经后分[C]//大正新脩大藏经. 第12册, No. 0377.
- [39] 义净著, 王邦维校注.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27.
- [40] 赞宁撰, 范祥雍点校. 宋高僧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27.
- [41] 甘肃省博物馆今藏有武周久视元年(700)写本, 首题《大般涅槃经机感茶毗品》, 中有《圣躯廓润品》品目, 尾题《大般涅槃经后分卷第四十二》。见: 秦明智. 跋唐人写本《大般涅槃经后分》[J]. 敦煌学研究(西北师院学报增刊), 1984(10).
- [42] 李静杰. 造像碑的涅槃经变[J]. 敦煌研究, 1997(1): 77.
- [43] 樊锦诗主编. 法华经故事[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122-123.
- [44] 朱捷元, 秦波. 陕西长安和耀县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J]. 考古, 1974(2): 127.
- [45]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北京考古四十年[M]. 北京: 燕山出版社, 1990.
- [46] 刘友恒, 聂连顺. 河北正定开元寺发现初唐地宫[J]. 文物, 1995(6): 64-66.
- [47] 樊维岳, 阮新正, 冉素茹. 蓝田出土墨顶舍利石函[J]. 考古与文物, 1991(2): 20-23.
- [48]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 甘肃省泾川县出土的唐代舍利石函[J]. 文物, 1966(3): 8.
- [49] 同[48].
- [50] 张怀群. 世界之宝古泾州大云寺佛舍利金银棺现世追记[J]. 丝绸之路, 2004(7): 6.
- [51] 杨效俊. 临潼庆山寺舍利地宫壁画试析[J]. 文博, 2011(3): 88-94.
- [52] 主室北部砖砌筑台基也见于1987年甘肃省天水市陈家庄出土的天宝六年(747)永安寺塔基遗址。莎柳. 甘肃天水市发现唐代永安寺舍利塔地宫[J]. 考古与文物, 1992(3): 65-68.
- [53] 会宁(诃陵国)若那跋陀罗译. 大般涅槃经后分[C]//大正新脩大藏经. 第12册, No. 0377.
- [54] 同[15]: 14.
- [55] 同[15]: 27.
- [56] 同[30].

(责任编辑 朱艳玲)

(上接65页)

- [33] 李丽娜曾进行过统计, 其二里头文化因素略高于宫殿区夯土墙区域, 见李丽娜. 关于郑州洛达庙期与南关外期文化性质的讨论[J]. 华夏考古, 2008(4).
- [34] 《郑州大师姑》H55 陶器器形统计表中器形栏列了2个大口罐, 查大师姑遗址遗迹登记表, 知其中一个是大口瓮的笔误。
- [35] 二里头遗址二里头二期文化中已经出现陶鬲, 此时期有两种形式的陶鬲(郑光. 二里头陶器分期初论[C]//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我们可以看到器物图的是花边单耳鬲, 很难说就是商文化因素。至于另一种鬲是否属于商文化因素, 不敢妄论。而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的先商文化遗存见诸报道的极少。
- [36] 陈梦家. 殷墟卜辞综述[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6: 211.
- [37]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M].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0.
- [38] 刘绪. 有关夏代年代和夏文化测年的几点看法[J]. 中原文物, 2001(2).
- [39] 赵光贤. 夏商周年代考[J]. 历史研究, 1986(6).
- [40] 王巍. 中国古代国家形成论纲[C]//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王先生没有说明估定商年的依据。
- [41] 王文华. 从大师姑遗址的发掘看二里头四期文化的性质(提要)[C]//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 [42] 同[16].

(责任编辑 李自智)